

1960 年中阿边界谈判搁浅之谜探析

张 安

[摘要]关于中阿边界谈判问题的研究,目前学界已有的主流观点,是认为阿富汗于 1962 年 12 月最先提出谈判的。但近期笔者在查阅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时,无意中发现一个重要史实:早在 1960 年陈毅访问阿富汗之前,中国外交部就曾派副部长耿飚等向阿富汗试探提出关于中阿边界问题的谈判建议。只不过阿富汗当时不愿谈而已。阿富汗之所以不愿与中国就边界问题进行商谈,主要由于其时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因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关系日趋紧张、阿苏关系日益亲密、阿印关系一贯良好,阿富汗从自身国家利益着眼,在没有充分了解中国边界政策的情况下只好采取回避态度。但此次流产的谈判同样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展现中国践行和平共处的国家形象,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污蔑,也为后来的边界谈判提供了经验教训。

[关键词]中国;阿富汗;边界谈判;搁浅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2)05-0045-08

“中阿边界长约 90 余公里,界线沿穆斯塔格分水岭而行,地形明显,边沿地区几无人烟,平均海拔 5500 公尺左右。近数十年内,中阿边界一直平静无事,不存在争议。”^①近年来,学界已对中阿边界问题进行了一定研究,其中主要集中于中阿边界的产生——英俄侵略中国帕米尔问题,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阿边界谈判问题上,但这些研究大多学术性有所欠缺,多是用描述性的语言,简略概述,甚至部分论著中还存在着一些具体史实的谬误或误差。如在中阿边界谈判问题上,几乎所有论者均认为是阿富汗于 1962 年 12 月最先提出谈判的^②。但笔者在查阅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时,无意中发现一个重要史实:早在 1960 年陈毅访问阿富汗之前,中国外交部就曾派副部长耿飚等向阿富汗试探提出中阿边界问题谈判。只不过阿富汗当时不愿谈而已^③。因此,笔者拟以中国外交部解密的外交档案为基础,辅以相关材料,对这一段隐秘的历史进行梳理和分析,以呈现给学界。

中阿之间本无边界问题。1747 年阿富汗正式建国后,一度成为中国的属国^④。在以中国为中心的藩属朝贡体系下,两国之间一直“有边无界”,根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边界问题。而且清朝前

① 《中国和阿富汗贸易关系及存在的问题、中阿边界简况、中阿关系大事记(1950 年—1964 年)及普什图尼斯坦问题》(1964 年 10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204-01327-05。

② 韩念龙《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3 页;刘宏焯《中国睦邻史——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17 页;张植荣《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9 页;黄安余《新中国外交史》,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13 页等。

③ 《驻阿富汗使馆调研文章:从中阿关系看美、苏、我争夺阿富汗的形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345-02。

④ 据魏源《圣武记》记载“爱乌汗(即阿富汗)亦闻中国之盛,未知其道里远近,遂遣使偕来,欲一睹中国广大。二十七年(乾隆二十七年,即 1762 年)入贡,为中国回疆最西之属国。”参见魏源《圣武记》(上),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75 页。《清史稿》等也有相似记载。

期,中阿边境远在阿姆河上游的喷赤河,现在中阿边界所处的中亚帕米尔高原是中国固有版图的一部分。但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阿两国均遭受列强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阿富汗则成为英俄的角逐场,其外交权曾长期被英国把持。正是在这种状况下,英俄共同炮制了中阿边界问题。1895年,英俄背着中国签订了《关于帕米尔地区的势力范围的协议》,表面上是划分“俄英两国在维多利亚湖(即萨雷库里湖)以东的势力范围”^①,实质上是英俄从自身的利益出发^②,肆意践踏中国的领土主权,私分中国帕米尔地区。根据该协议,帕米尔河以南的大帕米尔部分地区和布才拱巴什及其以东直至萨雷阔勒岭的中国领土被并入阿富汗^③。对此,虽然清政府极为愤慨,强调“后日必重申前说”^④,但直到其灭亡乃至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政府都无力顾及。当时的阿富汗埃米尔拉赫曼也本不愿接受,在英国答应提供5亿卢比的特别补助年金后,才勉强同意对中阿边界之瓦罕地区实行统治^⑤。此后,在英国的唆使、支持下,阿富汗在瓦罕地区委任了行政长官,并派驻军队,造成事实上的统治,形成实际控制线。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际国内事务千头万绪,中国政府尚未来得及考虑与邻国商谈边界问题,而基本上采取了暂时维持现状的政策。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为安定四邻,打破西方国家污蔑中国有扩展领土野心的谣言,再加上边界冲突开始显现,边界问题的解决开始提上日程。对此,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就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许多人感到中国要威胁别人,因此我们愿意在这里提出我们的保证,我们也希望别人作同样的保证。”“中国同十二个国家接壤,同有些国家的一部分边界尚未划定。我们准备同邻邦确定这些边界,在此以前我们同意维持现状,对于未确定的边界承认它尚未确定。我们约束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边界一步,如果发生这类事情,我们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并立即退回国境。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我们如果一次谈不好,就再谈,但不能超越现状。”^⑥为此,1956年9月27日,周恩来召集云南、西藏、新疆等省、自治区领导人开会,商讨三省、自治区与邻国的边界问题。同月29日,他又召集有关方面人士商谈中国同有关国家的边界问题。^⑦1958年7月,国务院边界委员会成立,决定与周边国家“在5年至10年内陆续解决未定边界问题”。“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大体顺序是:中缅、中印、中阿和中克”^⑧。^⑨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加强边界工作的指示》,指示认为,“我们应该抓紧时机做好准备工作,以便在有必要和有条件同某一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致处于被动。”^⑩指示强调,“为了加强对中国边界的调查研究,以便有步骤地解决边界问题,请有关的各省、区党委注意抓紧对边界工作的

① G. J. Alder. *British India's Northern Frontier 1865 - 1895*. London: Longmans, 1963. p334.

② 俄国自彼得大帝时起就梦想打通南下印度洋的通道,但其时力所不逮。英国则为了保卫其英属印度的安全,力图用缓冲国阿富汗隔开俄国与印度。

③ 吕一燃《中国近代边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02页。

④ 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6页。

⑤ 彭树智《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64页。

⑥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4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22页。

⑧ 意指中国与克什米尔的边界,主要指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边界。

⑨ 《1958年4月25日外交部关于边界问题的通知》,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77/4/1。转引自李丹慧《同志加兄弟:195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一)》,《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⑩ 《1958年12月13日中央关于加强边界工作的指示》,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X50/2/258。转引自李丹慧《同志加兄弟:195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一)》,《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第88页。

领导。”^①“与民族主义国家接壤的省、区党委,更应该把边界工作列入党委经常的议事日程中。”^②在此前后,中国政府以缅甸为突破口,经过5年的和平谈判,1960年1月与缅甸签订《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协定》,同年10月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成功地解决了中缅边界问题,为中国与其他邻国的边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和范例。

在中缅边界问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1960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确定了“努力主动地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的外交方针,“讨论了解决长期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决定“要迅速跟他们解决边界问题,包括印度在内”,“把我们四周的边界问题都解决了,就稳定了我们跟邻国的关系”^③。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60年上半年,中尼边界谈判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此情况下,中国外交部准备趁热打铁,以中缅、中尼等边界问题的解决为契机,借当年陈毅访问阿富汗之机试探提出与阿富汗进行边界问题的谈判。考虑到中阿边界和中苏边界问题牵涉在一起,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过去中阿两国均有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遭遇,中阿建交后两国关系一直发展平稳,且阿富汗是小国,对其进行必要的照顾,有利于展现中国和平共处、睦邻友好的决心、诚心,中国外交部决定按照双方实际管辖情况划界,“对阿富汗现有的领土范围”,“持尊重态度”^④,“希望中阿两国政府经过签订一项协定并且互换地图,把这条传统习惯线正式划定下来,使两国的边界永远是和平友好的边界”^⑤。

应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邀请,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拟于1960年8月访问阿富汗。此行的目的,中国外交部打算就三个问题与阿富汗谈判:一是两国签订友好互不侵犯条约;二是经济技术援助协定;三是边界问题。根据外交惯例,1960年7月19日,中国外交部派耿飚副部长赴阿富汗驻华使馆就这三个问题和阿驻华大使萨马德进行提前沟通。考虑到阿富汗的接受程度,在磋商中,耿飚谨慎地以“个人的一种想法”的名义试探提出“中缅两国的边界问题,大概在9月底就可能全盘解决;中国同尼泊尔的边界问题也可以今年年底解决。中国同阿富汗也有一点共同的边界,很短,大概不到100公里长。历史上我们两国从无边界纠纷;两国地图对于这段传统边界的画法,也没有什么大出入;而且那个地区是高山,分水岭也很明确。因此,如果阿富汗政府认为有需要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同贵国政府达成一项协议并且相互交换地图,把两国的传统边界线正式规定下来,从而使两国边界永远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耿飚还表示“希望大使阁下把我个人的这个想法转达给贵国政府考虑,当然即使不签订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我们仍将是永远遵守这条传统习惯边界,继续维护中阿之间和平友好的边界。”“如果阿富汗政府认为没有必要签订边界问题协定,我个人的这个想法就算是多余的。”耿飚进一步解释:进行中阿边界谈判只不过由于“在历史上中阿两国政府好似从来没有签订过任何协定和条约来正式规定或确定过这条传统边界。两国政府也未曾为此交换过地图。”而“并不是因为边界上有什么问题”。萨马德当即表示,愿将这一问题转告阿富汗政府。但关于边界问题,他本人“还没有考虑过”,“对边界的具体情况完全无知,又未得到过任何指示,所以无法发表任何意见”不过“觉得中阿之间不存在边界问题”。^⑥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页。

② 《1958年12月13日中央关于加强边界工作的指示》,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X50/2/258。转引自李丹慧《同志加兄弟:195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一)》,《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第88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

④ 《中国和阿富汗贸易关系及存在的问题、中阿边界简况、中阿关系大事记(1950年—1964年)及普什图尼斯坦问题》(1964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204-01327-05。

⑤ 《耿飚副外长同阿富汗驻华大使萨马德谈话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032-07。

⑥ 《耿飚副外长同阿富汗驻华大使萨马德谈话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032-07。

接到萨马德的报告后,1960年7月23日上午,阿外交副大臣即决定约见中国驻阿使馆代办^①。当晚,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又就边界问题与中国驻阿使馆代办进行了交谈。纳伊姆询问中国驻阿使馆代办“至于边界问题,我不知是指什么。您是否知道?”^②得知阿方的态度,7月28日,陈毅接见阿富汗驻华大使萨马德,向萨明确表示“中阿两国的传统边界是很明确的,不存在任何边界纠纷,一直是和平友好的边界,而且两国地图对于传统边界的画法也是一致的。”因此,“这次去不需要谈边界问题”。^③

为打消阿富汗的疑虑,1960年8月11日,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郝汀拜会阿外交副大臣苏里曼,再次表达了中方“中阿之间的边界无任何问题,是友好的边界”、“这次不谈”^④的态度。但中国政府没有放弃努力。8月21日,陈毅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进行访问,次日陈毅与阿首相达乌德、副首相纳伊姆进行了历时三小时的会谈,期间陈毅向阿领导人详尽地阐明中国对整个边界问题的态度。陈毅再一次强调中阿边界无问题,对此达乌德表示赞同。但达乌德左右而言他,只是表示“中国是阿友好邻邦,希望中国同他国边界问题得到良好解决”^⑤,绝口不提中阿边界问题。对此,中方不愿强人所难,就此搁置了谈判。至此,此次中阿边界谈判在阿富汗的刻意回避下胎死腹中。

二

那么,为什么阿富汗当时不愿与中国就边界问题进行商谈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因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关系日趋紧张。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是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政策的产物。历史上,普什图尼斯坦原属阿富汗领土。为了分割桀骜不驯的普什图部族,减少其抵抗力量,进而达到控制、征服阿富汗的目的,1893年英国以武力胁迫阿富汗签订《杜兰协定》,用“杜兰线”将普什图尼斯坦地区一分为二,将“杜兰线”以东部分并入英属印度的西北边省。1947年印巴分治时,阿富汗积极争取普什图尼斯坦地区重新合并于阿富汗,这种希望未能实现。而英国通过“公民投票”将上述地区强制并入巴基斯坦。阿富汗对此极为不满,认为此次投票是非法的,于是积极支持该地区部落要求独立的运动,力图“收复”该地区。由此导致阿巴矛盾尖锐。从1949年开始,两国边境地区时有武装冲突,两国关系不时处于紧张状态。1955年两国因此第一次断交。后来虽一度缓和,但到1959年下半年,阿巴关系因这一问题再度恶化,乃至1960年和1961年两国兵戎相见,发生数次大规模边界冲突,并导致1961年9月的阿巴断交。^⑥由于双方实力对比,阿处于不利地位,且这一问题一直被阿富汗视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和“阿对外关系上最重要的问题”^⑦,阿富汗不得不殚精竭虑思索对策。当中国外交部酝酿提出边界谈判之际,正是阿富汗焦头烂额之时,根本没有力量兼顾到中阿边界问题。而此时,中巴关系有所缓和的迹象,使阿富汗也不

① 《外交部与我驻阿富汗使馆之间就陈毅副总理赴阿富汗王国访问关于日程安排等问题商谈的电报、谈话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122-01。其时,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郝汀因协调陈毅访阿具体事宜回国。

② 《外交部与我驻阿富汗使馆之间就陈毅副总理赴阿富汗王国访问关于日程安排等问题商谈的电报、谈话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122-01。

③ 《陈毅副总理接见阿富汗驻华大使萨马德谈话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032-08。

④ 《我驻阿富汗使馆函报关于郝汀大使同阿外交副大臣苏里曼的谈话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119-02。

⑤ 《我驻阿富汗使馆电报告关于陈毅副总理访阿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119-03。

⑥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争端及阿对印巴冲突的表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350-01;《1959年下半年以来的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关系的新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450-06。

⑦ 《阿富汗王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基本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197-06。

得不担心。特别是1960年2月10日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明确向中国驻巴大使丁国钰表达了“关于巴吉尔吉特地区与中国新疆地区的边界问题,巴很愿意与中国进行谈判”^①的愿望,再加上中方的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一向持不介入的立场”^②,使阿富汗疑虑重重。因此,在中国真实意图没有较大的把握和对中国边界政策没有充分认识的情况下,阿富汗不会贸然和中国进行边界问题的谈判。

第二,阿苏关系日益亲密。1953年达乌德出任阿富汗首相后,尽管阿富汗一再宣布奉行传统的中立政策,并力图用美国制衡苏联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迫使阿富汗不得不对苏联产生依赖,阿苏关系日益亲密。这一点,在1959年底到1960年上半年越发明显,“阿苏关系在这一时期中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仅1960年上半年,苏阿两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种代表团来往达11起之多,其中“3月赫鲁晓夫访阿是阿苏关系史上处于空前高涨的阶段。4月达乌德又去苏联晤谈苏对阿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援助问题。据悉,苏已同意提供三亿美元的援助,这就初步决定了,在今后相当时间内阿仍将主要依靠苏联进行建设。”根据阿富汗中立政策的传统,一般“阿同苏签订了一项协定,必然相应的,同美国也立即搞些名堂”,但这一时期则不然,“同期内阿美关系上就很平淡”。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巴对阿在政治和经济上压力的加大,阿美、阿巴矛盾的越发尖锐化。”^③1959年底,美国利用阿社会改革中宗教、地主势力的不满,同巴一起煽起了规模较大的坎大哈骚乱事件,使阿内政呈现一定程度的不稳,也使王室大为震动。在阿富汗外交的风向标——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1960年4月间,中央条约组织在德黑兰开会,“美帝又伙同土、伊等仆从公开支持巴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对阿在政治上施加压力”^④,使“阿在该问题上感到孤立,故极想取得苏联的公开支持”^⑤,苏联一如既往坚定地表示支持。对此,阿方颇感满意。不仅如此,美国还佯称打算停止赫尔曼德河工程,对阿所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援助问题,也迟迟不作回应,在经济上向阿施加压力,力图促使阿富汗向西方靠拢。而巴基斯坦在这一时期,也对阿的过境货物加强阻挠、刁难,使阿对外贸易受损不少。而且,“巴还利用所谓‘自由阿富汗’电台对阿王室进行攻击和揭底,有些揭露也确实打中了阿王室的痛处,使阿王室十分恼火和不安”^⑥。另外,从阿内部而言,阿经济本就困难重重。1960年阿又有不少地方灾情严重,导致农产品歉收,物价上涨。而且阿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满期,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资金又急需找到着落。因此,“在客观形势上已造成了形势逼人,使阿不得不进一步依靠苏联借以解决其内外困难”^⑦。而此时,中苏关系日益恶化。对此,“阿政府和各方人士已有所闻,也较注意”。但由于“分歧尚未公开,阿人不同我谈此问题,而是心照不宣。”^⑧再加上,“阿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一定的限度,阿对美帝仍然有恐惧和幻

① 《关于丁国钰大使递交国书的安排及向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递交国书后的谈话记录等(1960年1月30日—1960年4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402-02。

②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要求周恩来总理向阿富汗国王阐述巴政府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立场及韩念龙副外长同阿外交部秘书长埃特马迪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204-00991-05。

③ 《关于印度、缅甸、印尼、锡兰等国领导人访问苏联的情况及苏同印度、印尼、缅甸、阿富汗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109-02092-03。

④ 《关于印度、缅甸、印尼、锡兰等国领导人访问苏联的情况及苏同印度、印尼、缅甸、阿富汗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109-02092-03。

⑤ 《阿富汗王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基本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197-06。

⑥ 《我驻阿富汗使馆电告关于苏联赫鲁晓夫访问阿富汗的情况及阿苏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988-10。

⑦ 《我驻阿富汗使馆电告关于苏联赫鲁晓夫访问阿富汗的情况及阿苏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988-10。

⑧ 《苏联同阿富汗关系(196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109-03352-08。

想,仍然需要美国的经济技术援助”^①。在这样的情况下,阿富汗政治顾虑较多,要斟酌美苏的反应,必然不愿与中国过于亲密以引起苏联和美国的猜忌。因此,阿富汗从其中立政策的有效执行和本身所处的战略形势着眼,“为了保持和发展中阿关系”,虽愿意同中国进行一定的友好来往,但“阿政府从其总的对外政策来考虑,还不急需从我国取得重大的支持或具体帮助,因此也就未感到有极大地、多方面地发展中阿关系的必要。”^②1960年陈毅访问阿富汗,两国商谈并最终签订了中阿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阿两国关系已经有所发展,更重要的是阿富汗国家领土的安全已得到相应的保障。阿富汗考虑到苏、美等大国的态度,避而不谈中阿边界问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三,阿印关系一贯良好。自印度独立后,阿富汗同印度一直很友好。两国间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不但如此,在经济方面阿富汗同印度有很密切的关系,且“阿求印较多”^③。1950年,阿印签订贸易协定,规定两国在贸易、经商等方面享有最惠国待遇。1952年两国又签订贸易协定和航空协定。1955年阿巴关系恶化后,阿富汗一方面和苏联订立货物自由过境条约,另一方面也向印度寻求解除经济困难的办法。8月初,印度航空公司即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喀布尔商谈印阿间空运货物的问题,接着印度政府便批准将4架达科他式运输机售给阿富汗,使阿富汗成立了阿里亚娜航空公司。同年8、9月间,有40余架次的飞机从坎大哈载运水果到新德里和孟买等地,并从印度空运回阿富汗最需要的茶叶。“据阿前经济部的统计,1954至1955年间阿对印度的出口占总出口量的首位,即约26.6%,水果是最主要的出口货。在阿的进口量方面,印度占25.8%,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位。印度的棉布等日用品在喀布尔等地市场上较占优势。阿富汗的一部分游牧民族冬天时经巴基斯坦直至印度放牧。”^④后来,虽然随着阿苏贸易的发展,印度在阿进出口中降为第二位,但阿鲜干水果的主要市场仍为印度。在政治方面,阿印“在政治上需要相互支持”^⑤。由于阿巴两国存在着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印巴存在克什米尔问题,这就促使阿印相互靠拢,共同对付巴基斯坦。“印为了对付巴,加紧了对阿的拉拢。”印一再申言支持阿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的立场。“阿也有意借助印度向巴施加一定压力,从中取利。”^⑥由此,1950年两国签订了友好条约。接着两国都成立了友好协会。每年8月阿独立节,印度都派艺术团来阿祝贺。“尤其是1958年2月阿国王和1959年2月阿首相达乌德的相继访印,使两国关系更有所接近。”1959年9月尼赫鲁访问阿富汗,阿政府在礼遇上予以隆重接待,阿印关系更形紧密。在外交方面,“尼赫鲁政府初期奉行中立,表示反对殖民主义,同中国共同倡议五项原则,发起万隆会议。印度当时的和平中立政策对阿有一定影响。阿政府对于国际重大问题的态度,往往先看印度的做法,而后表态。”在军事方面,“在1956年苏联给阿军援之前,阿主要通过印度采购英国的新武器和军用物资。阿第一批飞行员就是由印度训练的。”此外,在文化方面,印对阿也有很大的影响。喀布尔电影院放映最多的影片,就是印度片。“印度统治阶级的‘非暴力’哲学,对阿富汗封建统治者用以麻醉人民意志,也是有用处的。”^⑦

在阿印关系持续良好发展的同时,1959年春西藏叛乱后,中印关系开始紧张。1959年夏,两国因边界争端开始发生冲突,边界局势日趋恶化。“亚洲的这两个大国关系的发展,必然要影响到它们的邻国”^⑧。阿政府虽为了平衡关系保持中立,但1959年9月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访华前,特意

① 《我驻阿富汗使馆电告关于苏联赫鲁晓夫访问阿富汗的情况及阿苏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988-10。

② 《1960年中国和阿富汗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47-02。

③ 《近年来阿富汗同印度关系的演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506-02。

④ 《阿富汗王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基本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197-06。

⑤ 《近年来阿富汗同印度关系的演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506-02。

⑥ 《刘少奇出国访问阿富汗参考资料:阿富汗当前的内外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547-02。

⑦ 《近年来阿富汗同印度关系的演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506-02。

⑧ 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8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121页。

提前经过印度和尼赫鲁进行了会晤。纳到达中国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亲自接见纳伊姆,解释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的立场。纳伊姆虽口头上表示理解,但其实心中对中国边界政策的疑虑并未打消^①。不仅如此,纳伊姆还辩解“印度不可能也不愿变成侵略者”。纳伊姆访华的同月,尼赫鲁访阿,“目的之一显然是中伤我国”。^②正是由于阿印关系一向良好,“在中印边界的问题上,阿感情上一直更加同情偏袒印度,甚至当周总理访印度期间,阿个别报纸还出现对我不友好的观点。”^③甚至阿有官员认为“印度若在边界问题完全继承帝国主义的要求是不合理,但中国对好些年的既成事实完全不认账也未必合适”。^④此外,“尼赫鲁和北平关系的恶化大大促进了印度民间和官方对改善巴基斯坦关系的兴趣。”^⑤“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阿担心印度可能因而改变其中立政策,同巴和好,以造成对阿的压力”。^⑥因此,考量印度的感受,更重要的是与印度保持良好关系更符合阿富汗的国家利益,阿富汗不愿与中国商谈边界问题就理所当然了。

此外,1960年3月,中国和尼泊尔开始对中尼边界问题进行谈判。“阿报纸报道了中尼签订联合公报、友好条约以及中尼边界上的珠穆朗玛峰问题的消息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阿对珠穆朗玛峰问题的进展,颇予注意,阿某些官员向我打听此事,报纸上也作了不少报道。”“帝国主义及印度反动势力,为了竭力冲淡周总理访尼的影响及中尼总理会谈的成就^⑦,故大肆宣传中尼的‘不一致’处,并加以扩大。而阿富汗因受西方宣传的影响,也就信以为真,对此感觉新奇。”^⑧这更使得阿富汗对中国多少怀有疑惧,在中阿边界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正由于以上几点原因,此次由中方推动的中阿边界谈判还未正式启动就不得不搁浅了。此次谈判虽然被迫搁置,但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并提供和积累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

第一,有利于展现中国践行和平共处的国家形象。其时,“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⑨。不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敌视中国,而且中苏分歧越来越大,印度支那地区局势日趋紧张,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也一触即发,且印尼排华事件愈演愈烈,造成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极为恶劣,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颇为不安。尽管中国政府力图尽快解决边界问题以为国内建设创设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但充分考虑阿富汗的立场和处境,没有强人所难。这充分地表明了“中国政府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并且坚持不懈地为此进行着真诚的努力”^⑩,展现

① 据美国中情局1960年5月17日关于中印关系的评估“即使中印边界争端通过谈判得以解决,亚洲各国近期内形成的对共产党中国的更为恐惧的看法也不会消失。”参见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8卷,第117页。

② 《近年来阿富汗同印度关系的演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506-02。

③ 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访问了印度,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进行了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会谈。

④ 《我驻阿富汗使馆报回关于阿富汗对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尼泊尔的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716-01。

⑤ 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8卷,第113页。

⑥ 《我驻阿富汗使馆报回关于阿富汗对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尼泊尔的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716-01。

⑦ 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访问了印度等国之后访问了尼泊尔,并与尼泊尔总理毕·普·柯伊拉腊进行了会谈。此次访问,中尼两国政府就珠穆朗玛峰问题等具体边界事项交换了意见,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和平友好条约》,并且交换了《中尼边界协定》批准书。

⑧ 《我驻阿富汗使馆报回关于阿富汗对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尼泊尔的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716-01。

⑨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⑩ 新华社《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外交政策——陈毅副总理在达乌德首相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0年8月23日第4版。

了中国热爱和平的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利于消弭某些国家的疑惧心理。也表明了不管情况怎样复杂,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中国政府都不会放弃努力。正如周恩来所言“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扩张,但人家不信,所以要用实际行动使它们慢慢相信,争取和平共处”^①。

第二,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污蔑。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污蔑中国“好战”,有“在亚洲追求政治霸权的野心”^②,以挑拨中国和邻国的关系,从而达到孤立、遏制中国的目的。此次流产的中阿边界谈判,“我一贯平等相待,不强加于人,我还经常照顾其困难,体谅其处境,耐心地等待,使阿当局逐渐增加了对我国的了解和信任”^③。在中阿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中,中国领导人也对阿作了许多宣传解释和团结友好的工作。中国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中国是诚心诚意地希望同自己所有的邻邦和睦相处的,使阿富汗对中国的边界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疑虑有所减弱,阿对中国执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诚意更加信赖,从而为后来中阿边界谈判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有利于其他邻国消除误会、解除怀疑。

第三,为后来的边界谈判提供了经验教训。边界谈判事关两国领土主权,双方必然会十分慎重。尽管其时中缅、中尼边界问题都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毕竟时间不长,阿富汗对中国还有一定疑虑,还没有完全体悟到中国的态度和苦心,对中国的边界政策并不是非常了解,且阿面临的国内外局势比较复杂,要顾忌美、苏、印等国态度,再加上一些国家的挑拨离间,因此,毫不讳言,中国此时提出中阿边界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这也告诉了我们,边界谈判要在适当的时机提出,要注意审时度势,综观两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局势,从而为后来的边界谈判提供了经验教训,如1961年3月,巴基斯坦政府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中巴边界谈判问题,但中国政府经过深思熟虑,直到1962年2月才同意与巴基斯坦进行边界谈判,这其中就有时机的把握问题。

但估计阿富汗自身也没有料到,时隔两年之后,阿富汗主动向中方提出了边界谈判的要求。中国不计前嫌,很快进行回应。最终,中阿两国顺利进行了边界谈判。“这是我历次边界谈判中最顺利最迅速的一次谈判”^④。1963年11月22日,《中阿边界条约》正式签订,成功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本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博士生 安徽财经大学思政部讲师 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江俊伟]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7页。

② 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8卷,第117页。

③ 《驻阿富汗使馆调研文章:从中阿关系看美、苏、我争夺阿富汗的形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345-02。

④ 《阿富汗内务大臣卡尤姆访华:关于签订中国和阿富汗边界条约的时间、地点、人选的初步方案的请示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馆藏档案,档案号:204-00888-03。